

社会樊篱的流动^{*}

——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

高 勇

提要: 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的“地位获得”范式和“阶层流动”范式背后存在着两个强假设:从时间维度上讲,存在静态的社会结构背景;从空间维度上看,存在同质的变化趋势。但是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不是发生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因此代际流动就表现为“双重流动”:不仅仅是人在社会樊篱间流动,而且樊篱本身的位置也发生流动。中国代际流动的根本问题不只是“流动的樊篱”,而且更重要的是“樊篱的流动”。本文利用“中国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尝试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

关键词: 结构变迁 社会流动 阶层结构 流动樊篱

自“二战”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数据收集质量不断提高,统计分析方法不断创新,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学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模型最为繁复的领域之一,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现在的代际流动研究已经过于依赖于统计模型与方法的进展,而缺乏理论与视角上的突破,不再能够为更为广阔的社会学核心理论作出贡献,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流沟通也受到限制(Grusky, 2001)。但是,中国学者却对代际流动的模式与机制进行了诸多创新性的探讨(李路路, 2003a, 2003b, 2006; 陆学艺主编, 2004; 李春玲, 2005),这仰赖于中国的结构变迁背景为代际流动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问题。

本文从一个侧面来探讨结构变迁背景下的代际流动问题,认为在结构变迁背景下必须要凸现“双重流动”:人在社会樊篱间的流动和社会樊篱自身的流动。我们将首先对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社会结构的静态性、同质性假设进行反思;然后结合中国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提出

^{*} 本文脱胎于作者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在此感谢导师刘世定教授的悉心教诲。本文曾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学沙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变迁调查”课题讨论会、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论坛上宣读,分别得到过如下师友的批评与建议:戴建中、雷筱、韩嘉玲、李伟东、马丹、包路芳、沈崇麟、陈婴婴、夏传玲、张宛丽、李春玲、李煜、冯仕政等,在此一并致谢!

自身的研究方案;最后利用“中国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对提出的观点进行验证。

一、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指向:流动的樊篱

西方代际流动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路数:一是以布劳和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为代表的“地位获得”范式(Blau & Duncan, 1967),二是以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稳定之流》为代表的“阶层流动”范式(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一)“地位获得”范式

概而言之,“地位获得”范式的研究一般会先按照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因素对各种职业地位进行评分,然后看子代职业评分与父代职业评分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一些中介因素(如父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初职地位评分)的关系。如果子代职业评分与父代之间的关系紧密,则代表代际流动度较低,反之则较高。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子代受教育程度来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主要是“自致性因素”;如果上述关系主要通过父代职业地位来直接传递,那么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就主要是“先赋性因素”。布劳和邓肯的研究结果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而且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主要是“自致性因素”。出现此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断地产生着新的位置,产生了新的流动空间,由此有了流动的动力;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效率的追求,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得以盛行,教育成为重要的流动桥梁,家庭出身因素在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地位获得”范式在理论上的预设是根本无视“社会樊篱”的存在。该理论认为,最主要的流动障碍来自于“社会位置空间”和“流动手段”的限制:只要现代社会持续出现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新的“社会位置空间”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只要教育规模不断发展,“流动手段”就会被充分地生产和供应出来。因此,工业化、现代化下的代际流动是一幅乐观的图景。至于“社会樊篱”,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存在但无足轻重,对于社会整体图景没有根本性的影响。从方法上讲,“地位获得”范

式分析是建立在几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第一,存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设想,父代时的职业评分体系到了子代时仍然能够适用?然而事实上,在一个结构变动的社会中(例如当代中国),同一种职业的地位得分在20、30年间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时再使用上述假设便存在问题了。第二,社会中所有成员(至少大部分成员)的流动路径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设想把所有人的流动过程纳入到同一个路径分析方程中去?然而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父代农民流动为子代农民工的逻辑和父代干部流动为子代私营企业主的逻辑能够用同一种模式(例如所谓的“后致性因素”)来解释吗?换言之,在时间上静态、在空间上同质,这是“地位获得”范式的两个强假设。正是由于这两个强假设,“地位获得”范式获得了强大的理论概括力和方法吸引力,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获得了经验解释力。问题是,当时时空背景转换到20世纪末的中国时,这些假设是否还有解释力?

(二)“阶层流动”范式

“阶层流动”范式会根据父代和子代职业分别确定其阶层归属,然后看子代阶层归属与父代阶层归属之间的关系。“阶层流动”范式预设了“社会樊篱”的存在,而且强调要区分“社会位置空间”扩展造成的流动和“社会樊篱”变得宽松造成的流动。与此种理念相适应,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分析工具——建立在“相对流动率”概念基础上的对数线性模型(Hauser, 1978)。

经验观察显示,某一阶层(如白领阶层)的社会空间是在不断扩大,但关键的问题是,出身于原本优势阶层者(如资产者)还是原本弱势阶层者(如工人)成为白领而非蓝领的比率更高?这两个比率之比即为“相对流动率”。如果相对流动率随时间变化而逐渐趋向于1,则表明代际流动机会在社会各群体间都平均分布;如果相对流动率随时间变化而逐渐偏离1,则表明代际流动机会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分布趋向于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相对流动率表明了一个社会中流动樊篱的疏密程度。费瑟曼、琼斯、豪泽1975年提出的“相对流动率稳定命题”认为,在西方工业国家中,这种“社会樊篱”的疏密程度基本相似,而这种疏密程度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层结构所决定(Featherman & Hauser, 1975)。之后,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利用大规模的数据资料证明了上述

命题大体上符合西方国家的现实(Erikson &Goldthorpe, 1992)。谢宇利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重新分析了费瑟曼等人的数据,认为西方工业国家中代际流动模式可能没有差异,但是代际流动的数量存在差异(Xie, 1992);也就是说,西方工业国家中社会樊篱的基本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其疏密程度却有所区别。

鉴于以上分析,“阶层流动”范式似乎更为贴近当代中国的现实。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与方法取向,仍然会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第一,“阶层流动”范式仍然预设了一个静态的社会结构背景,即社会樊篱尽管其疏密程度在不同社会有所差异,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但是社会樊篱的位置却是静态不变的。在流动的图景下面,其预设的是一个静态的体系——把这些“社会樊篱”视为固化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樊篱间流动,但樊篱本身并不移动。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在他们的模型中预设了四种“流动樊篱”(在其术语中被称为“拓扑效应”):1.等级;2.继承;3.部门障碍;4.某些阶层间的亲和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些社会樊篱在各不同国家中有着相同的布局,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没有呈现出大的变动趋势。第二,“阶层流动”范式预设了所有社会樊篱的疏密程度变化是同方向的,这种统一的变化方向被称为社会的开放度(或反之,僵硬程度);但是,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某一社会樊篱变得开放乃至消失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樊篱却在被编织、强化?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时间上静态、在空间上同质这样两个强假设同样在“阶层流动”范式中存在。如此,不难发现,在面对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时,仍然未加反思地沿用这两个假设,只能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不过,“代际流动”研究仍然建立在非常强的“静态”假定上,这一悖论也恰恰成为新的研究的生长点。

二、代际流动问题在中国:社会樊篱的流动

当我们把目光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布劳—邓肯的数据收集时点)和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埃里克森—戈德索普的数据收集时点)拉回到当代中国时,发现必须对他们研究中的两个假设加以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在重组中,代际流动不是发生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而是一种双重的“流动”:人在社会樊篱间流动;同时,社

会樊篱本身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动,或者仅仅因为人员的频繁穿行,不仅其疏密程度在变动,而且其位置也在流动。我们必须把人的流动与社会樊篱的流动同时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出中国代际流动的真实图景,我们的理论语言才不至于在现实面前太显笨拙。我们的根本问题不只是“流动的樊篱”,而且更重要的是“樊篱的流动”。

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对于代际流动研究的意义,前人已经多有论述。陆学艺等在一项非常有影响的代际流动研究中指出,“5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几度重大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而工业化国家学者研究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研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的代际流动,所以两者在社会流动的机会、规则、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陆学艺主编,2004:9)。那么,适宜的分析框架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使用的社会流动解释框架,就由四类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变量以及一类综合性变量组成:(1)先赋性变量;(2)后致性变量;(3)经济—社会结构变量;(4)制度—政策安排;(5)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陆学艺主编,2004:29)。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其实是“地位获得”范式与“阶层流动”范式的混合,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了结构变量或制度变量,但是它却没有能够用一个核心议题把结构变量或制度变量与代际流动问题本身勾连起来。结构变量或制度变量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落实在代际流动研究问题上,它的核心议题到底是什么?更进一步地,如何用主流研究的语言表达出我们的本土问题?我们认为,勾连结构—制度变量与代际流动问题的一个核心策略就是去关心社会樊篱的流动,并把这一因素引入到社会流动的传统分析模型中。

李春玲对于中国社会流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她的研究结论是:“我们发现很难简单地依据流动情况,判断经济改革之前或之后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开放或更封闭,因为,在某些方面社会变得更加开放,而同时在另一些方面社会封闭性又有所发展。这两个方向的变化同时发生,使当前的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复杂性特征”(李春玲,2005:402)。这个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她已经意识到社会结构背景的变化给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带来的挑战: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的社会结构各有开放之处,也各有封闭之处。然而,进一步的问题

是：从哪一点上入手可以破解这种“复杂性”？在我们看来，破解这种复杂性的入手之处在于研究流动樊篱本身的变化：在哪个时间段、何种社会樊篱发生了何种变化？只有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才可能解析中国代际流动模式中的“复杂性”。

李春玲在研究代内流动时，特别关注到了流动樊篱的问题（她称之为结构性屏障）：“根据前面部分对十个阶层 90 年代流动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人们的社会流动过程中有三道因阶层分化而导致的结构屏障。第一道屏障是源于是否占有最重要的资源种类（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而导致的阶层分化……第二道屏障是源于劳动技术分工（白领职业与蓝领职业）或者说拥有文化资源与没有文化资源而导致的阶层分化……第三道屏障存在于有机会争取到就业岗位的人与没机会获得工作的人之间”（李春玲，2005：396）。这虽然是她在研究代内流动时提出的，但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代际流动樊篱的起点。然而仍然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所谓第三道屏障，与前两道屏障并不在同一个概念层次上，并不能构成一道真正的阶层流动屏障；第二，权力与经济资源屏障和文化资源屏障，其实并不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两种屏障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第三，权力与经济资源屏障和文化资源屏障也并不是天然静态存在的，它们的作用强度也是在变化着的；第四，除了这两种屏障之外，还存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屏障机制？

李路路在研究代际流动时，在方法上借鉴了“阶层流动”的范式，如采用了包括父代地位、子代地位、时间、城市等 4 个变量的对数线性统计模型。他的结论是：“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意义上，原有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没有随着制度转型的过程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是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甚至有所强化”（李路路，2003a：134）。我们同意，社会樊篱仍然存在或者仍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但是樊篱的布局是否依旧？在其后的一项研究中，李路路借用了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等人使用的拓扑图来设计了几种主要的代际间阶级继承关系和阶级渗透关系，其中特别指出了在阶层分析框架中存在的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界、农民阶层与非农劳动者之间的分界，以及自雇佣者阶层的自我封闭性（李路路，2006）。虽然这已经非常明显地涉及了“社会樊篱”问题，但是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比较中显示的共性背后

的社会流动机制,而不是中国代际流动樊篱的时段变化,因此也没有触及到社会樊篱的流动问题。

缘此,本文下面的分析任务,就是要用量化的方法手段,揭示出中国代际流动图景中“樊篱的流动”。

三、数据上的支持:扩展 UNIDIFF 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社会变迁调查(第二阶段)”。这次调查在全国的6个城市(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沈阳)中抽样,这6个城市分布于全国的东西南北,其中,大连、上海、广州三城市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兰州、成都和南宁位于西部地区,它们大体代表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的城市状况。每一个城市均抽取800份有效样本,6个城市的总样本量为4800份。每一个城市均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总体,因此,城市以下的抽样是独立进行的。各城市的抽样方案是“按总体规模等比例的概率抽样”(PPS, Proportional to Population Size Sampling)的抽样设计。用作总体规模的指标是抽样单位的年末人口数,调查对象是6个城市中市辖区内的20—65岁常住人口。入户访问的时间是2005年3月至6月之间。

数据中包括回答人目前的职业,以及回答人15岁时父亲的职业类别,这是我们进行代际流动分析的基础资料。在“中国社会变迁调查”的数据采集过程中,要求回答人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种或工作职责,然后由调查员直接记录,最后在问卷回收后统一根据人口普查的职业编码进行后编码。职业大类分为以下几类:1.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2. 群众团体领导干部;3. 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4. 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干部;5. 专业技术人员;6. 教师;7. 经济业务人员;8. 办事人员;9. 销售人员;10. 服务人员;11. 工人;12. 农、林、牧、渔劳动者;13. 军人;14. 其他。

西方对于职业的分类框架一般都是沿用戈德索普等人创建的EGP阶层分类图式,这种分类图式因其提出者而得名(Erikson, Goldthorpe & Portocarero, 1979; 缩写为EGP)。EGP阶层分类图式有各种变体,最常见

的是把阶层分为 10 大类: 1. 大业主、高级专业人士和高层管理人员; 2. 低级专业人士、低层管理人员; 3. 负责例行事务的非体力劳动者; 4. 有雇员的小业主; 5. 没有雇员的小业主; 6. 农场主或管理人员; 7. 低等技术员和体力劳动主管; 8. 技术性体力劳动者; 9. 无技术与半技术体力劳动者; 10. 无技术农业工人。EGP 阶层分类图式是依据四种潜在标准而提出的: 雇佣关系、权威、技能和部门。但是这样的分类图式未必适合于我们的研究。一个比较次要的原因是, 我们的数据并不足够大, 如果父代与子代都按照这种图式来分类, 那么将产生一个 10×10 的列联表, 其中必定会出现众多的空格或者频数太少的格子, 这将对于分析结果的稳定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过去的 30 年中,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像西方那样定型化, 阶层体系还处于一个发育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研究代际流动, 父代和子代的分类都宜粗不宜细。因此, 我们借鉴魏昂德等人在研究中国代际流动时的分类模式, 将父代和子代都粗略地分为三类: 管理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非精英 (Walder, 1995)。第一类管理精英, 包括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他们在组织资源上占有优势; 第二类技术精英, 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教师, 他们在文化资源上占有优势; 第三类一般劳动者, 包括工人、服务人员、销售人员、办事人员、经济业务人员, 以及农业从业者。

数据共有 4800 条记录, 但是有 1731 位回答人在调查时没有工作 (如离退休、失业、下岗、正在上学) 等; 有工作的回答人当中有 390 位 15 岁时其父亲没有工作; 此外, 有 312 位回答人本人的职业或者其父亲的职业填写不够详尽, 无法分类; 有 575 位回答人没有填写他第一份工作开始的时间。因此, 最后进入分析的数据共包括了 1792 个样本。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境, 我们依据回答人 (即子代) 初次参加工作的时段, 把数据分为了三部分: 1978 年及以前参加工作者; 1979—1990 年参加工作者; 1991—2005 年参加工作者 (2005 年是数据收集的年份)。

(二) 模型设定

我们设定以下 4 个模型,^① 通过考察它们对于经验数据的描述拟

^① 本文中所有统计模型的拟合都是利用 LEM 程序包完成。LEM 软件可以在网页 (<http://www.uvt.nl/faculteiten>) 上下载。

合程度,来检验前述理论思路是否能够得到经验支撑。其中前3个模型是西方代际流动研究中最常见的,而第4个模型则是在第3个模型(UNIDIFF模型)基础上略作扩展后得到的。各个模型的设定和理论意义略述如下。

1. 条件独立模型:樊篱根本不存在

如果父代与子代间完全不存在关联关系,那么模型将有如下形式:

$$\ln(F_{fst}) = \lambda + \lambda_f^F + \lambda_s^S + \lambda_t^T + \lambda_{ft}^{FT} + \lambda_{st}^{ST} \quad (\text{模型 1})$$

其中 F_{fst} 为期望频数, $f=1, 2, 3$; $s=1, 2, 3$; $t=1, 2, 3$ 。 F 表示父代的职业类别, S 表示子代的职业类别, T 表示子代参加工作的时段。因此, λ_f^F 、 λ_s^S 、 λ_t^T 为边缘效应, λ_{ft}^{FT} 为父代职业类别与子代参加工作时段的二阶交互作用, λ_{st}^{ST} 为子代职业类别与子代参加工作时段的二阶交互作用。相对于饱和模型而言,上述模型缺失父代与子代变量间的二阶交互作用,也缺失父代、子代、时段三类变量间的三阶交互作用。因此,模型背后的前提假定是父代与子代不存在任何关联,这也就意味着,代际流动根本不存在任何樊篱。

2. 关联效应不变模型:樊篱存在,但不变动

在条件独立模型中加入父代与子代变量间的二阶交互作用,就产生了“关联效应不变模型”:

$$\ln(F_{fst}) = \lambda + \lambda_f^F + \lambda_s^S + \lambda_t^T + \lambda_{fs}^{FS} + \lambda_{st}^{ST} + \lambda_{fs}^{FS} \quad (\text{模型 2})$$

新加入的 λ_{fs}^{FS} 为父代职业类别与子代职业类别的二阶交互作用。

这一模型背后的假定是:父代与子代存在着关联关系,但是父代、子代、时段三类变量之间的三阶交互作用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不随时代而有所变化,在各个时代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完全相同的。换言之,代际流动的樊篱存在,但它并不随时段而变化。

3. UNIDIFF模型:樊篱存在,强度有变化,但樊篱布局不变化

为了研究代际流动中相对机会的变化趋势,谢宇1992年提出了“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Xie, 1992)。几乎同时,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也独立地提出了同一模型(Erikson & Goldthorpe, 1992),他们把它称为UNIDIFF模型,因为它假定不同的时间段下所有的优比值都将会朝同一方向统一地变动(uniform difference)。用谢宇的话说,就是“(模型)所需要的前提仅仅是用来做比较的表格对于起源—终点关联具有共同

的模式”(Xie, 1992)。

此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ln(F_{fst}) = \lambda + \lambda_f^f + \lambda_s^s + \lambda_t^t + \lambda_{ft}^{FT} + \lambda_{st}^{ST} + \beta_t \psi_s \quad (\text{模型 3})$$

上述模型中最重要的是新加入的两类参数: β_t 参数和 ψ_s 参数。 β_t 参数也被称为层面得分(level scores), 它估计的是在 t 时间段中的流动强度(即樊篱的疏密程度); ψ_s 参数也被称为行列关联得分(R-C association scores), 它估计的是在各个时间段中保持不变的流动模式(即樊篱的布局)。这个模型背后的思想是, 把每个对数优比分解为两个部分的乘积, 一部分表示在每个时间段中都保持不变的一般流动模式, 即 ψ 参数; 一部分表示在每个时间段中都有所不同的流动强度, 即 β_t 参数。假定第一个时间段中的 β_1 被设定为 1, 那么如果估计出的下一个时间段的 β_2 小于 1, 则表明在下一时间段中, 所有的对数优比都朝 0 移动了, 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变得比前一时间段更弱了; 而如果 β_2 大于 1, 则表明所有的对数优比都远离 0 了, 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变得比前一时间段更强了。

我们可以更为直白地将上述模型解释为: 樊篱存在(表示为一般流动模式, 即 ψ 参数), 且其疏密程度有所变动(表示为流动强度, 即 β_t 参数), 但樊篱本身的布局并不改变(表示为一般流动模式并不随时间变动, 即 ψ 参数并不随 t 变动)。

模型需要对于行列关联得分(即 ψ 类参数)进行一些设定(Xie, 1992), 数据中父代和子代都分有三类, 流动表是一个 3×3 的表, 因此我们就将行列关联得分设定为完全二项交互模型(即谢宇提及的 FI 模型), 这时共有 $(3-1) \times (3-1) = 4$ 个 ψ 参数是可识别的。这种设定背后的思想是, 社会樊篱的格局是这样的: 技术精英子女进入管理精英的樊篱; 管理精英子女进入技术精英的樊篱; 非精英子女进入技术精英的樊篱; 非精英子女进入管理精英的樊篱。另外的假设是: 这种樊篱格局一直没有变, 变的是社会开放度(樊篱的疏密程度)。在 LEM 程序中, ψ 相应的设计矩阵如表 1 所示。我们的编码方式为虚拟编码而非效应编码, 因为使用虚拟编码的参数估计更容易有直接的解释。参照组都为“非精英”类别。

4. 扩展的 UNIDIFF 模型: 樊篱存在, 而且在强度变动的同时樊篱布局也在变动

那么如何设定出一个新的模型,以同时反映出樊篱在强度上和布局上的变化呢?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前述 UNIDIFF 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扩展。为此,我们设计了以下模型:

$$\ln(F_{fst}) = \lambda + \lambda_f^F + \lambda_s^S + \lambda_t^T + \lambda_{ft}^{FT} + \lambda_{st}^{ST} + \sum_{m=1}^M \beta_t^m \psi_s^m \quad (\text{模型 4})$$

表 1 模型 3 中 ψ 的设计矩阵

	非精英	技术精英	管理精英
非精英	0	0	0
技术精英	0	1	2
管理精英	0	3	4

谢宇在 1992 年论文的结尾处已提到:“可以对对数可积模型做更广泛的扩展,以便能够包括针对二项行列关联的多维度设定方法”(Xie, 1992: 391)。比如可以将 ψ 分解为不同的维度,模型 4 正是这样的一种扩展,其重要含义在于,它可以揭示出社会樊篱变动中除了社会开放度这样一种疏密程度变化之外的变化。

(1)上述模型中,社会樊篱是多维度的,即 ψ 不是只有 1 个,而是 M 个的: $\psi_s^1, \psi_s^2, \dots, \psi_s^M$ 。这样就可以清楚地把各种不同来源、不同因素的社会樊篱区分开来。

我们在这里只是探索性地把社会樊篱分为两类(即 M=2):一是技术精英因拥有知识资本而非技术精英产生樊篱,或者管理精英因拥有权力经济资本而非管理精英产生樊篱(类似于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继承”樊篱)。二是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因同属于精英层而在社会价值观上相近、社会层级上相邻,由此产生的与非精英层的樊篱(类似于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等级”樊篱)。以图 1 来表示,第一种樊篱是以虚线形式来表示,第二种樊篱则是以实线形式来表示。

换言之,我们也可以把这两类樊篱理解为两种优势:第一类樊篱表示了出身“管理精英”家庭者对管理精英职业的继承性优势和出身“技术精英”家庭者对技术精英职业的继承性优势(为了简化模型,我们设定这两个优势参数是相同的)。第二类樊篱表示了出身“管理精英”家庭者进入“技术精英”职业的优势与出身“技术精英”家庭者进入“管理精英”职业的优势(为了简化模型,我们设定这两个优势参数也是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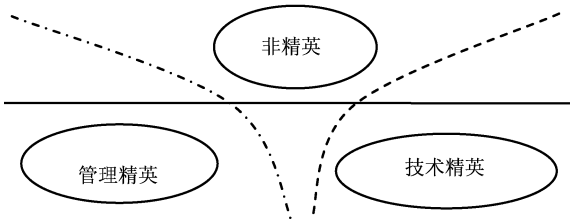


图 1 两类社会樊篱的示意图

的)。这样，每一种樊篱就可以用一个参数来表示。

在 LEM 程序中， ψ_{fs}^1 和 ψ_{fs}^2 相应的设计矩阵如表 2 所示。与模型 3 中一样，我们的编码方式为虚拟编码，参照组都为“非精英”类别。

表 2 模型 4 中 ψ_{fs}^1 和 ψ_{fs}^2 的设计矩阵

ψ_{fs}^1			
	非精英	技术精英	管理精英
非精英	0	0	0
技术精英	0	1	0
管理精英	0	0	1
ψ_{fs}^2			
	非精英	技术精英	管理精英
非精英	0	0	0
技术精英	0	0	1
管理精英	0	1	0

(2)更重要的是，对于不同类别的 ψ_{fs}^1 和 ψ_{fs}^2 ，我们将分别考察它在三个时期的强度变化： $\beta_{i_1}^1, \beta_{i_2}^1, \beta_{i_3}^1; \beta_{i_1}^2, \beta_{i_2}^2, \beta_{i_3}^2$ 。这样就有可能在考察樊篱的变化时，看清楚在某些樊篱变得开放的同时，另一些樊篱却在强化。通过这样一个模型设计，我们就凸现出了樊篱格局的变化：最初樊篱的布局是以哪一种为主？之后又经过了怎样的强度变化？目前樊篱的布局是怎样的？

(三)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各个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情况。表 3 列出了 4 个模型的各种统计量，包括相对于饱和模型的对数似然比卡方

(L^2)及其概值、贝叶斯信息标准(BIC)、相异指数(D)等。以下对于模型
的比较将主要利用似然比卡方检验进行,同时参考贝叶斯信息标准。
似然比卡方检验一般只适用于嵌套模型间的比较,概值越小,说明两个
模型间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它一般都是与饱和模型相比较,但也可以
用于非饱和模型间的互相比较。贝叶斯信息标准可以适用于非嵌套模
型间的比较,它一般在样本量较大时更为可信;贝叶斯信息标准为负
的模型优于饱和模型,负值越大,模型越好。

模型 1 为条件独立模型,自由度为 12,对数似然比卡方为 49.8,为
基线卡方值。模型 2 加入了更强的约束条件,对数似然比卡方消减了
81.1,然而其卡方概值仍然只有 0.31,说明其拟合仍然与饱和模型有着
显著的区别,这表明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模型。模型 3 假定各时间段
中只存在着流动强度变化,而不存在流动模式变化,但它的拟合也并不
好,卡方概值只有 0.24,与饱和模型仍然有着显著区别;而与模型 2 相
比,它加入了 2 个参数之后卡方仅仅减少了 1.5,因此它的表现并没有
比模型 2 提高多少;从贝叶斯信息标准来看,它的表现甚至还不及模型
2。看来 UNIDIFF 模型并不能有效地拟合我们的数据(见表 3)。

表 3 各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

模 型	自由度 (df)	对数似然 卡方(L^2)	概值 (P)	卡方消减 比例(rL^2)	贝叶斯信息 标准(BIC)	相异指 数(D)
1 条件独立模型	12	49.8	.00	.0	-40.1	5.2
2 关联不变模型	8	9.4	.31	81.1	-50.5	1.4
3 UNIDIFF 模型	6	7.9	.24	84.1	-37.0	1.1
4 扩展 UNIDIFF 模型	6	1.5	.96	97.0	-43.4	.6
模型间的比较						
模型 3 与模型 2	2	1.5	.47			
模型 4 与模型 2	2	6.4	.04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模型 4 的表现,它假定社会樊篱不仅在疏密程
度上有变动,而且在整体布局上也有变动(即樊篱也存在位置上的流
动)。模型 4 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与条件独立模型相比,它成功地消
减了 97.0 的基线卡方值;与饱和模型相比,它的拟合效果已经与饱和
模型很难分辨,似然比卡方检验的概值高达 0.96;与关联不变模型相
比有着显著区别,概值只有 0.04。惟一有所不足的是,这一模型在贝

叶斯信息标准上表现不佳, 低于第 2 个模型, 这主要是由于自由度上的损失所造成的。在样本量不够大的时候,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此, 综合来看, 模型 4 无疑地优于模型 3 (参见表 3)。初步的数据结果支持了我们最初的判断: 只有同时考虑到“流动的樊篱”和“樊篱的流动”, 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代际流动的现实。

(四)模型的参数估计与解释

模型 4 是最佳模型, 因此我们只考察模型 4 的参数估计。模型参数中我们真正关心的只是 β_t^1 、 ψ_s 、 β_t^2 、 ψ_s^2 , 所以表 4 中只给出了模型 4 的这几类参数估计值, 其余的参数在此略去。

表 4 模型 4 的参数估计值

	β_t^1	ψ_s	$\beta_t^1 \psi_s$	β_t^2	ψ_s^2	$\beta_t^2 \psi_s^2$
1978 年以前	1.00	1.32	1.32	1.00	0.05	0.05
1979—1990 年	0.49		0.65	12.95		0.65
1991—2005 年	0.73		0.96	19.90		1.00

ψ_s 表示第一类樊篱, 即技术精英因拥有知识资本而非技术精英产生樊篱, 或者管理精英因拥有权力经济资本而非管理精英产生樊篱。总体而言, 这一类樊篱始终都较为稳固地存在着, 尽管其疏密程度在不同时间段中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如 1979—1990 年, 这种樊篱就变得大为宽松, 几乎降低了一半的效用 ($\beta_t^1 \psi_s$ 值从 1.32 降低到 0.65); 然而在 1991—2005 年间, 这一樊篱似乎又变得致密起来 ($\beta_t^1 \psi_s$ 值从 0.65 升高为 0.96), 但是还远远没有回升到 1978 年以前的水平。第一种樊篱的变化呈现出一种 U 形趋势 (见表 4)。

ψ_s^2 表示第二类樊篱, 即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因同属于精英层而在社会价值观上相近、社会层级上相邻, 由此产生的与非精英层的樊篱。我们看到, 这种樊篱在 30 年间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它简直就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在 1978 年之前, 这道樊篱是不存在的 ($\beta_t^2 \psi_s^2$ 值仅为 0.05); 到了 1979—1990 年间, 这道樊篱逐步形成 ($\beta_t^2 \psi_s^2$ 值为 0.65); 到 1991—2005 年, 它更加稳固而致密地树立起来 ($\beta_t^2 \psi_s^2$ 值为 1.00) (见表 4)。

图 2 更为直观地显示了两类樊篱的强度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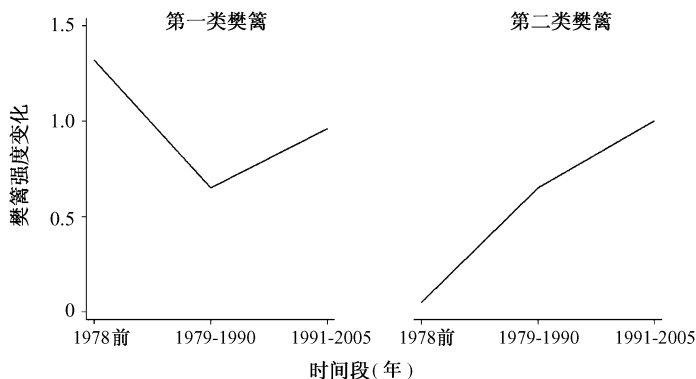


图 2 两类樊篱的强度变化趋势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代际流动经历了从第一种格局向第二种格局的演化:在第一种格局中,代际流动主要指向技术精英/非技术精英之间,以及管理精英/非管理精英之间的樊篱(即图 3 中的两条虚线)。而到了第二种格局,前述樊篱仍然稳固存在,尽管其致密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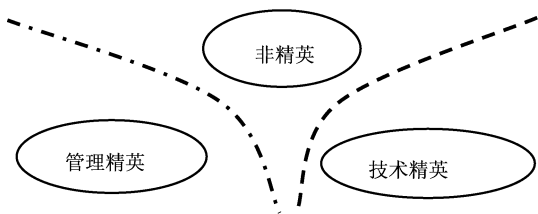


图 3 樊篱的第一种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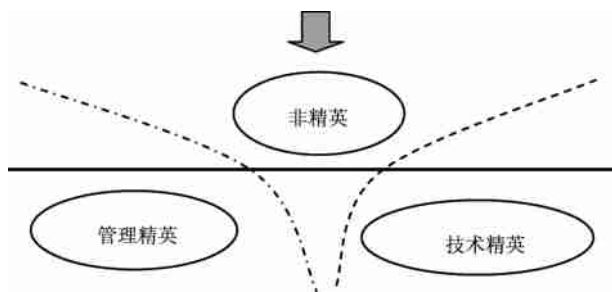


图 4 樊篱的第二种格局

经过了一个 U 形过程之后略有下降(即图 4 中的两条虚线变淡了);但更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新的樊篱,即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非精英之间的樊篱(即图 4 中出现了一条新的实线)。总体而言,可以这样概括我们的发现: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始终都较为稳固地存在着,尽管在 1979—1990 年间其致密程度曾经略有下降;但与此同时,另一类樊篱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在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对参数估计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代际流动的社会樊篱布局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四、讨论:理论与方法上的反思

本研究数据量尚不够大,方法模型也并不精致,阶层分类也只有简单的三大类;它也没有能够回答社会樊篱的流动与制度政策安排、阶层价值观变迁、经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但它的意义更多的是启发性的,对于社会樊篱变化原因及后果的讨论有可能深化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认识,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更细致的讨论。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希望对此加以明确。

西方的社会学研究路数有许多隐而不现的假设,只有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方法路径才有其正当性。在他们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假设前提可以起到简化问题、增强分析效力的作用。但是当时空背景转移时,这些隐而不现的假设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和忘却,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也往往因此而失去。重视时空背景,这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传统智慧之一,社会学者应对此有足够的自觉和敏感。本文正是通过对于西方代际流动研究的假设进行反思,提出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应同时关注“流动的樊篱”与“樊篱的流动”。

在代际流动研究上,本文希望回归到结构主义的取向上去。代际流动研究可以分为个体主义取向和结构主义取向。布劳—邓肯模型实质上是个体主义取向的,它描述的是个体通过教育获得地位这样的故事。阶层流动范式更多地带有结构主义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却被“社会开放度”等简单化的问题所遮蔽。本文指出,代际流动研究重要的不只是先赋性还是后致性因素,不只是社会开放度,重要的还有社会结构中的樊篱以及樊篱的变迁问题。

代际流动研究在方法上应当更为多元化。传统上认为量化研究倾向于静态的、关系式的研究,但本文恰恰是用量化方法揭示出了变迁的社会图景,因此对于任何方法都不应有僵化的认识。在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结构时,变量分析、模型建构、民族志、历史比较研究、过程—事件分析同样都可能是灵活的方法工具。在将来,探讨社会樊篱的流动与制度政策安排、阶层价值观变迁、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共同努力。代际流动研究期待着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而多样化的方法一定会为代际流动研究这一经典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李春玲, 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路路, 2003a,《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2003b,《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社会学研究》第5期。
- , 2006,《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煜, 2007,《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陆学艺主编, 200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laug, P. M. & D. O.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Erikson, R. & J.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R., J. H. Goldthorpe & L. Portocar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 Featherman, D., F. Jones & R. Hauser 1975, “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 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4.
- Grusky, David (ed.) 2001,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Hauser, R. M. 1978,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Mobility Table.” *Social Forces* 56.
- Walder, A. G.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Xie, Yu 1992, “The 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7.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

PAPER

Mobility of Social Barrier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structural change *Gao Yong* 1

Abstract: The status-attainment paradigm and the class mobility paradigm, which consist of the mainstream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esearch, have two hypotheses.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y presume that the social structural context is static.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ey assume that the mobility has a unique trend. Howeve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does not have a static structural context. In fact, there is a “double-mobility”: agency’s mobility between social barriers and social barriers’ mobility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The key issue of Chines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s the mobility of social barriers. By mining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in Urban China”, the paper has verified these propos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yout of social barriers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discussion of the causality of those changes ma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Ethic and Fairness of Daughter’s Supporting to Her Parents’ Family: Gender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 in rural areas of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Tang Can, Ma Chunhua & Shi Jinqun* 18

Abstract According to rules of patrilineal family system, daughter does not have obligations to support her parents as the informal member of her parents’ family. However, daughter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y and welfare of her parents’ family nowadays. Focusing on this emerging fact in rural areas, the article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 ethic principles of daughter’s and son’s supporting to their parents’ famil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ethic principles of daughter’s supporting to her parents, and gender fairness revealed by the fact. It is concluded that daughter participating in supporting her parents in rural areas show that the conflictual and commentary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amily structure coexist during family change.

State, Market and Life Chances: Evidence from rural Guangdong
 *Chen Nabo* 37